

《冀中一日》： 讲好抗战故事的文艺经典

□ 侯玉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做好弘扬革命文化工作，离不开讲好红色故事。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早在80多年前，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起了一个叫作“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号召敌后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斗争故事。据统计，有多达数万群众、士兵及文化工作者向《冀中一日》编委会投稿，并在整个华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创作活动。重温《冀中一日》的创作背景、写作过程及主要内容，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讲好红色故事，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战火中的精神高地

冀中位于华北腹地，是当时河北生活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迅速沦陷。冀中地区不甘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在吕正操等抗日将领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冀中军区成立，并成为督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冀中地区以平原为主，八路军与民兵无法以山地等有利地形作掩护，使得这里的抗日形势一直十分严峻。据当事人回忆，日伪敌寇的摩托化部队经常进行“扫荡”，为了抗击敌人，全冀中都把纵横万余里的庄稼道挖成了深五六尺、宽可走骡马大车的交通沟。因此冀中地区农民买牲口的时候，先要试试是否会跳交通沟，如果不会，价钱就得另议。因为敌人“扫荡”时牲口不会跳沟就很容易被敌伪抢走。喂小羊的儿童在平素就训练羊群爬沟跳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

为抗击敌寇，冀中抗日根据地除了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外，也高度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以鼓舞军民抗战热情。早在全面抗战前，包括歌曲、戏剧在内的文艺活动在北方农村地区便有一定基础，不少村

庄设有业余剧团。日寇入侵曾一度给当地的文艺活动造成严重影响，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却将华北农民的精神生活推向了新高度。冀中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初，便将发展文化教育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迅速。以村剧团为例，当时凡是根据地内的村庄，几乎村村都有。1940年《新华日报》记者走进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目睹这里的文化工作后，曾由衷地感慨道：“谁来到晋察冀边区，谁也会对边区的群众文化教育的伟大努力和成就感感到无限的钦悦和敬佩。”“使我们感受到这是整个中国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推进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创立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参与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这无疑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群众书写历史

据曾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李英儒回忆，时任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副主任又是小说家兼戏剧家的王林最先提出了《冀中一日》的写作倡议，“高尔基创建了《世界一日》，茅盾筹建了《中国一日》，我们冀中这个既有光荣传统又是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地区，为什么不可以搞一部《冀中一日》哩。”王林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吕正操、程子华等冀中抗日根据地领导的支持。1941年春天，根据地正式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备委员会，并于4月20日，发布了《关于〈冀中一日〉的写作通知》。为了让广大群众知晓、参与写作运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如当时根据地内各岗哨处设有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有“冀中一日”四个大字。

经过宣传动员，写作运动很快成为根据地家喻户晓的大事。为了让不识字的农民群众也参与到运动中，当时采取了能动笔的动笔，不能动笔的可请人代笔的办法。于是5月27日那一天，“代笔人”成了根据地的焦点人物，群众一大早就拿着已经准备好的纸张去找人代写。从6月份起，

编辑小组陆续收到从各地送来的稿件。进入7、8月份，稿件越来越多，各个村庄的人们“挑着担子，推着小车，一麻袋一麻袋的送到了”，足见群众参与写作运动热情之高涨，活动影响之广泛。不同于其他文艺创作经典，《冀中一日》最大的特色体现在群众性。在这本书中，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是历史的书写者。

以平凡铸就伟大

《冀中一日》所以要把记录的日子选在1941年5月27日，并不是因为这天特殊，恰恰是因为这天只是“红五月”里的平常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日常生活。然而从全书内容来看，平凡的一日却处处彰显着抗日军民的伟大。《冀中一日》共收录200多篇文稿，全集共30余万字，分“鬼蜮魍魉”“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几个专题，并从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等方面真实反映了敌后群众的抗日生活。

书中的一篇文章，记录了妇女救国联合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在那个年代，冀中抗日根据地妇女不仅追求平等，身着短服，参加劳动，还勇敢地加入到对敌斗争中来。妇救会在执行破坏敌人公路任务时，非但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态，还为“妇女姐妹们的战斗气概感到自豪”。足见根据地的妇女们已经率先实现了解放，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又如书中记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召开的各式各样的会议，像学习会、区务会议、县议会、讨论会、欢迎会、展览会、选举大会、检讨会、村民大会、婆婆会、说理会、公审大会等。开会已经成为老百姓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书中记录了一次为选举村小组长而召开的会议，在一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提名某人后，“五十多岁的老汉朝他把眼一瞪说：‘我不同意。他担任工作好几个月了，干的成绩是什么呀！光会说漂亮话，不干实事……让我说咱们还是提咱们原来的主任吧！你们看，人家当了一年多了，工作积极负责，又大公无私，咱们赈济贫民不都是经人家手作的吗？家家都说做得不错。你们说怎么样！’”说罢，

老汉的提议在乡民的一致赞成中获得了通过。这段记录生动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生活，他们真正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冀中一日》用平凡的一日，记录了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民众日常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从心理上的惧怕到抗争、政治上的封建到民主、知识上的蒙昧到文明。

用文艺凝聚力量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从提出到征稿，再从编辑到发行，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对伟大抗战精神的坚持与弘扬。据参与《冀中一日》编辑选稿工作的周岐回忆：“《冀中一日》的每一篇，哪怕是只有几百字，几十字，都是对敌斗争情况的真实记录。每印一篇，校对一篇，都使我增加一份力量。”《冀中一日》编校完成后，初版仅印了200部，本想在送各有关部门审定后，再正式出版。谁料日寇突然向根据地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绝大多数书稿都在坚壁清野过程中被损毁了，正式发行工作也只好暂时中止，但《冀中一日》所凝聚的抗战精神，并没有被破坏和击垮。冀中人民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以更加顽强的斗争精神投入到抗战中。“大扫荡”结束后，冀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冀中一日》的写作经验，继续发动了“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等群众性写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为了发扬抗战精神，鼓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曾于1959年和1962年，先后整理出版了《冀中一日》的第一、二辑和第三、四辑。我们今天通常看到的《冀中一日》则是2011年的再版本。而《冀中一日》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文艺经典，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了由人民书写历史、用平凡见证伟大的独特书写方式。其中蕴含的伟大抗战精神也将历久弥新，成为砥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为“宗圣”。曾子天生资质并非聪颖，《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对其评价也只有“参也鲁”三字。然而，值得人深思的是，为何生性鲁钝、资质平平的曾子，最终能得到“宗圣”的儒学大家地位？其关键一点就在于曾子好学。学则觉矣，曾子为学不倦且能将所学知识及时转化成智慧，并终其一生持守奉行仁义之道，为后世传承儒道树立了典范。

“仁以为己任”

读书治学必须先行立志，并且要立大志。曾子认为，读书治学应当以弘扬仁道作为目标。

《论语·泰伯》篇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即读书人。曾子认为读书人肩负着弘扬仁道的使命，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所以纵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在所不惜。曾子还对能担重任的君子（读书人中的典范）进行褒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意指有这样的人，年幼的孩子可以托付于他，国家的大事同样可以托付于他，面对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能够毫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在曾子看来，担当治国大任是“士”与君子这类读书人的本分。正因如此，曾子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注重从自省修身、提升品格、不断温习学习等各方面提升自己，曾子终成一代大儒。

“不能则学，疑则问”

笃实严谨，勤学好问，是治学的基本态度。曾子强调做学问忌讳的是内心浮躁、骄傲自满，看重的是笃学好问、谦敬有礼。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中，曾子提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君子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及时把所学的内容付诸实践，对于合乎道义之事，即使困难也绝不畏难逃避，对于能够博取虚名且容易做到的事情坚决不去做。《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中他又说：“不能则学，疑则问。”为学过程中，遇到这样抑或那样的问题、疑虑，都在所难免，不懂时要善于静心钻研，有疑问则要主动向智者请教，如此才能增长知识才干。关于提问的具体策略，曾子也颇有心得，他说：“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向尊长请教要谦恭有礼，对请教的问题自己没搞清楚，就等师长心情和状态适宜的时候再请教。当然，如果师长没有解答也不要过于强求。这是曾子求学问道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大戴礼记·主言》中记载着他向老师请教问题的具体情形，曾子问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挹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逊也。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也。’”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阮元在《曾子十篇》注释中提到：“得夫子之闲也难，是以敢问，此承闲复问之义也。”对于那些始终“耻不知而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的读书人，在曾子看来谓之“穷民”。

『宗圣』曾子的 治学之道

□ 申静思



“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是治学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礼记·大学》中，孔子教示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曾子对老师的教诲谨记于心、躬行实践，他认为学问的提升，亦是一个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记载，曾子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博”，“大通也”，孔门论学首在博，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但是，曾子认为，君子治学做到了“博”还不够，要“博”“习”“知”“行”“让”五事并进不可偏废。曾子主张，为学者即便学识已经达到渊博的程度了，但还要懂得时时温习；尽管做到温习了，还要能够真正理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等到领悟经典中的义理后，还要能够按照它进行具体实践；最后，做到知行合一仍不够，倘若能推贤向善、与人无争，方能显境界。曾子认为，君子为学能够严谨细致地做到这五个方面才算完满。曾子提出的这种五步学习过程论，对后来的学习理论和实践，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庸》中出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显然是在曾子学习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学习是一个既有时代意义，又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课题，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成长和长成，因而一直被中外历代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视。作为我国儒学大师的曾子，正是凭借着自身坚忍不拔、诚敬笃实的性格，专心致志地追求治世之道，他在治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治学经验，即“仁以为己任”的崇高治学目标、“笃实严谨、勤学好问”的治学态度、“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治学法则，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耀眼的火花。

很多年了，每天吃着雪白的馒头，但我已经忘记了小麦原有的味道，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山东乳山一个叫作银滩的小镇，我从一个农民家里买了几十斤小麦，并委托卖家加工成面粉，面粉中加入酵母菌，揉成馒头放进锅里。因为带着麸皮，它颜色虽然有点黑，颗粒有点粗，模样有点丑，但当蒸汽在房间中弥漫开来的时候，一种久远的记忆慢慢被唤醒，我猛然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小麦味道。

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下过乡干过农活，但我对小麦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可我知道小麦是五谷中生长周期最长的一种粮食作物。农谚说：七月底八月半，栽上麦子种上蒜。每年入冬前，小麦就被种进地里，然后发芽、分蘖，那时候所有的庄稼都已经收获，茫茫大地，从南到北，一片光秃秃的真干净。只有小麦生长出一片绿油油的青翠，为萧条的大地增添了几分生气。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冬的迫近，北风紧了，天转寒了，一个叫作“霜降”的节气驾临人间。在一场接一场的严霜中，万物凋零，小麦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蔫头，耷脑，碧绿的叶子发黄变



□ 王明新

雪是小麦的被子

黑，一天天枯萎，好像到了生命的尽头。小麦当然没有死，而是在收场，防御，并默默地在根部积蓄力量。随着冬的步伐加快，一场大雪从天而降，雪覆盖了苍茫大地，也覆盖了小麦。然后大的雪或小的雪也许会一场接着一场。

农民说，雪是小麦的被子，这话智慧而形象，因为雪的覆盖，可以让小麦躲过冻害的袭扰。在阳光照耀下，雪融化成水，带着地表养分，一点点渗入地下，滋养着小麦。如果遇上一个连一场雪也没有的“干冬”，小麦便紧紧贴伏在干旱的土地上，靠自己瘦弱的身躯抵御刺骨寒冷。在严寒和干旱的双重打击下，小麦也变得越发稀疏、瘦弱，但它是那样勇敢，又是那样坚

韧。就这样默默地坚守着，挨过一个漫漫长冬。正是这种坚守，让它们吸纳了更多日月精华、天地灵气，提高了自身品质。这时候种地的人们都躲进屋里“猫冬”，深冬的小麦好像被所有人遗忘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也许是一场春雪，也许是一场春雨，也许是猫过冬之后农民为小麦浇的一次返青水，小麦慢慢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经过一个冬天的力量积蓄，小麦重新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它一身翠绿，很快又重新将大地覆盖起来。它长势迅猛，拔节的声音在和煦春风的吹拂和温暖阳光的抚摸下铿然有声。之后，抽穗，开花，灌浆。“一声杜宇春归尽”，在布谷鸟“饱谷”“饱谷”的叫声中，仿佛是一夜之

间，小麦就成熟成一片金灿灿的黄，那是黄河水的颜色，那是让农民喜笑颜开的颜色。于是，初夏的风里饱含着小麦的馨香，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尽情飘荡。

我对小麦味道的记忆来自少年时代。那时候我家住在城郊，接近乡下，大家都不富裕，为了增加点收入，家里常年养着一两只羊。我常去地里给羊割草，顺手掐几个青青的麦穗带回家，在刚刚做完饭的余火中烤熟，用手掌轻轻一搓，麦粒和麦皮就分开了，用嘴轻轻吹去麸皮，手掌中剩下的是烤得青而微黄的麦粒，迫不及待地放进口中，一种融进了泥土、霜雪、阳光和雨水的混合味道，沁人心脾，久久滞留于唇齿之间。让我无法忘怀的，还有我

在“五七知青农场”做知青的记忆。每年6月1日，都是小麦开镰收割的日子，此后的十多天，知青们早晨4点多钟就去地里，我所在的班负责小麦的晾晒。天还不亮，第一车小麦就进场了，我们用桑叉把小麦从车上卸下来，在场上摊开，然后是一车接着一车，卸车、摊开，顶着太阳一遍遍翻晒。整整一个麦季都赤着脚、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等把每一粒小麦都收进仓，我们被晒得浑身黧黑。农民把麦子收下来，即使再穷的人家，也会用新麦蒸出一锅香喷喷的馒头，咬一口，麦香四溢，那种香，香得淳朴，香得厚重，香得深沉，吃完了还让人久久回味。这是对劳动者的最好礼赞，对劳动者的最好奖赏。

童年的时候，城镇居民吃粮本，成人每月二十三斤，白面的比例少之又少。我们家的一点白面，冬至一顿饺子，春节一顿饺子，其余的白面隔一段时间母亲蒸几个白面馒头去看望姥姥，再就是给早起上班的父亲做一顿手擀面。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白面的。

渐渐地，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但从这时候起，我们开始把小麦加工得越来越精，越来越细，有时还要加入可以使面粉变得更白的添加剂。馒头是越来越白也越来越好看了，可是这样的馒头也离泥土、霜雪、阳光和雨水的味道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失去了小麦质朴和纯真的品质。

几十年间吃穿住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在享用现代化带来丰厚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好多本真质朴的东西，包括这舌尖上美好的味道。这应该不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初衷。

